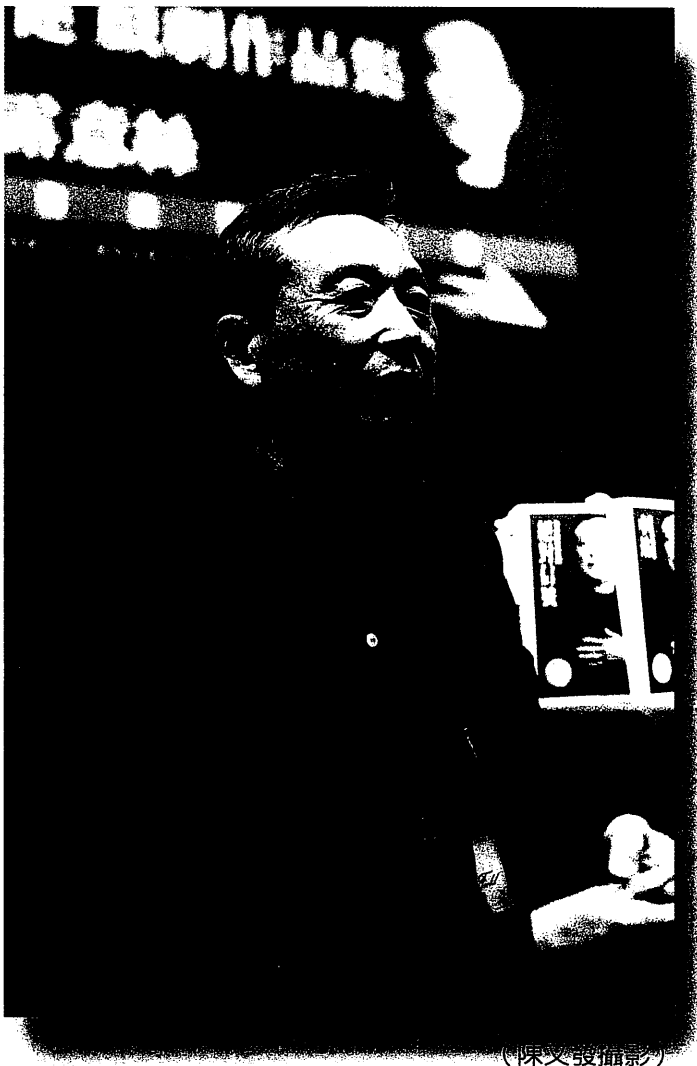


高行健—諾貝爾的靈山之光

台北時間十月十二日下午七點左右，瑞典學院公佈，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入籍法國的華人作家高行健。



(陳文設攝影)

此一歷史性的評選，一時之間至少誕生了三種意義：

一為這是百年來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多年來華語人口眾多，卻未曾有一位華語文學家名列諾貝爾文學獎之林，殷切期盼下，獲獎人選也一再由早年的沈從文、巴金、老舍，一直到王蒙、北島，年年預測，結果由一位流亡法國十餘年，在中國文壇上算頗「沉靜」的高行健，奪得此殊榮。

二為兩岸三地對此冷熱不同的反應，不無相當程度反映當地的文化氛圍與開放程度。

三為在二〇〇〇年最後兩個月，出版書市如繪了「洛陽紙貴」的成語現實版。

瑞典學院對高行健的頌詞是：「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瑞典學院發佈的新聞稿指出：高行健的文藝創作中，表現個人為了在大眾歷史中倖存而抗爭的文學得到了再生。他是一個懷疑者和洞察者，而並不聲稱他能解釋世

界。他的本意僅僅是在寫作中尋求自由。

生肖屬龍的高行健，二〇〇〇年是他的本命年。除獲得美金九十一萬五千元之獎金。他還成爲百年來首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

高行健當時擁有四本文學著作，十八本的劇本、以及眾多的繪畫作品。主要得獎作品《靈山》是一長篇小說，根據作者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偏遠地區漫遊中留下的印象寫成，包括殘存的巫術，當地民謠，和關於綠林好漢的傳說。小說由多個故事編織，並通過靈活自在的運用人稱代詞，我、你、他或她，達到了快速的視角變化，迫使讀者疑竇叢生。複雜多變的人稱代詞其實也是內心距離的稱呼，這種手法來自他的戲劇創作，常常要求演員既進入角色又能從外部描述角色。

有人評述，《靈山》是一部朝聖小說，是主人公沿著藝術虛構、生活、幻想和記憶各投射面的朝聖之旅。探討知識問題和內省的寫作方式，讓人想起德國浪漫派關於世界詩的宏偉觀念。

高行健另一部長篇《一個人的聖經》主題上一脈相承，但更具個人自傳的色彩。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誠筆觸詳細介紹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後成爲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觀者的經驗。他的敘述本可成爲異

議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絕這個角色，無意當一個救世主。他的文學創作沒有任何一種媚俗，甚至對善意也如此。高行健已經離婚的妻子，曾經向中共當局告發高行健。這段遭遇，也寫進這部自傳性的文革小說裡。

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得獎者「高行健」之後，弄翻了自以爲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的漢語文學的一池秋水；美國出版界首先暴露出對其作品的陌生。號稱全世界最大的網路書店「亞馬遜網路書店」，美國網站上唯一可以查到高行健的作品只有《彼岸》一書，這是高行健劇作的彙編，美國權威書評家哈洛德·布隆也坦承自己從未拜讀過高行健的作品，而高行健的小說作品《靈山》英譯本還是出自澳洲雪梨大學的亞洲研究學者之手，在美國並沒有發行。

而中國大陸的反應，似乎顯得「尷尬」。據香港《東方日報》的報導，中共總理朱鎔基在日本表示，對於高行健得獎一事感到高興，但是強調高行健是「法國人」，不是「中國人」。朱鎔基一番話，隨即遭中共外交部的否認，強調朱鎔基「並沒有遺憾高行健是法國人」，大陸官方的態度，刻意要淡化處理高行健得獎的消息，官方最頭痛的是如何面對這位「異議份子」。

高行健早在一九八七年便離開中國，他最重要的中文作品都在台灣出版，短篇小說《給我老爺買魚竿》一九八九年出版（聯合文學），一九八二年夏便開始創作的長篇小說《靈山》一九九〇年由台灣聯經出版，戲劇六種則在一九九五年出版（帝教）。高行健的劇作也有在台灣搬演過，一九九〇年陳玲玲在國立藝術學院曾執導《彼岸》，一九九二年果陀劇團在台北車站劇廳，由梁志明導演《絕對信號》……等等。

將高行健引薦到台灣來的馬森教授回憶道，十年前，他為高行健將《靈山》與《給我老爺買魚竿》引薦到台灣尋求出版機會。短篇小說《給我老爺買魚竿》很快便由聯合文學出版，但《靈山》因為長篇巨著，主題深澀，千辛萬難才決定由聯經出版。出版後果然知己者少，遲遲沒有二刷。誰知道十年之後，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靈山》加印五萬本仍不敷所需，又加印十萬本依舊一掃而空。

出版《高行健戲劇六種》的帝教出版社，由於出版社小，原來合作的經銷商已拒絕來往，社內空有存書無法大量發行，只能用郵寄方式發書，博客來網路書店主動表示願意進書。《高行健戲劇六種》收錄高行健的劇作共六集，而原本只答應寫序的台大外文系胡耀恆教授，欲罷不能，

洋洋灑灑寫了四萬三千多字，於是出版社將他的文章，加上高行健其他的一些評論和雜文，集成第七冊《百年耕耘的豐收》。

另明鏡又在十一月出版一本由高行健多年的老友，香港大學教授劉再復，兼論人與作品的評論集《論高行健狀態》。有「傷痕文學之父」美譽的北京知名作家劉心武，由香港開益出版社出版新書《瞭解高行健》。藉由劉心武與高行健的交誼，讓世人了解高行健不為人知的一面。

從十二日諾貝爾文學獎揭曉起，台灣和香港的報紙都以頭版大篇幅報導，大陸則冷淡回應。高行健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在台灣書店造成購買熱潮，大約每天可售出二百本左右，對照《靈山》出書十一年來只再版一次的情形，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香港出版高行健作品的天地圖書和明報等出版社也接獲大量訂單，應接不暇。高行健本人也成為港台兩地爭相邀請的風雲人物。

受到各方媒體追逐，高行健生活步調大為改變。高行健當時住在一間兩房的公寓，位於巴黎東邊郊區一棟大樓的十九樓。每天花十六個鐘頭寫作和作畫，喜歡聽莫札特和梅湘的音樂。一九九八年起成為法國公民。他接受英國《衛報》專訪，回顧他從中國出走到巴黎的心路歷程，以

及從一個安靜創作的劇作家和小說家突然間舉世矚目的心境轉折。高行健形容，諾貝爾獎對他來說，簡直是「從天而降的奇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高行健抵達斯德哥爾摩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題為「文學的理由」的得獎感言。演說中，高行健強調是以作家的身分向世人發表他文學的創作理念。演講中他也嚴詞批評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對文學的破壞。他同時感謝法國接納了他，使他贏得自由創作的條件；也感謝瑞典文學院「讓一個脆弱的個人，面對世界發出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眾傳媒上聽得到的、微弱而不中聽的聲音」。

他感嘆過去一個世紀，中國的政治主宰文學，使文學弄得一度奄奄一息。而「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都同樣將文學與個人置於死地」。以革命之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伐，如公然禁書、燒書。「作家被殺害、監禁、流放和罰以苦役的，這百年來無以計數」。

高行健指出，他的長篇小說《靈山》正是他在「那些已嚴守自我審查的作品卻還遭到查禁之時著手的，純然爲了排遣內心的寂寞，爲自己而寫，並不指望有可能發表」。

高行健在演說中還再度提出他所主張

的「冷的文學」。這是恢復了本性的文學。他認爲，作家同讀者只要精神交流，彼此不必見面，不必交往，只通過作品溝通。文學本身不必對大眾不負有什麼義務。他還說，「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讓社會扼殺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學」，「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該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四十五分鐘的得獎感言，以中文發表，並以法語致簡短的感謝詞。十二月十日舉行頒獎儀式，高行健邀請了兩岸三地三位學者好友劉再復、方辛勳，以及胡耀恆，陪同他一起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共同分享他的榮耀。

高行健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生於江西贛縣，祖籍江蘇泰州，成長於二次大戰期間，父親爲銀行高級職員，母親爲業餘演員。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

曾在文革期間被送至勞改營，在當時燒毀了一整箱的手稿，他的作品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能出版。

寫作體裁包括小說、散文、翻譯、戲劇、評論等，也是藝術家、畫家，現居法國巴黎。他的作品已被譯爲十多種文字出

版，劇作也在法、德、英、美、義、奧、瑞典、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日、澳大利亞，乃至於非洲的象牙海岸、多哥、貝寧等國以及台灣和香港一再上演。他也曾在歐洲、亞洲、美洲等許多國家舉辦了數十次水墨畫個展，出版畫冊有《高行健水墨作品展》、《墨趣》、《墨與光》等。

他的朋友貝嶺，曾為文〈素描老高〉：「老高的側面輪廓極富雕塑感，在煙裊中。他心事浩茫。偶爾，嘴角倔強地緊抿，我們的友誼是在靜默中培養起來的。」

「他喜歡簡單的生活，好客，但並不擅交際；在流亡的中國作家和詩人中，是少有甘於寂寞者。在海外的中國文人，由於對母國的政治現狀反應兩極，更由於生存的不易，和語言的阻礙，很少有安貧樂道的心境，爭強好勝，故作驚人之語和驚人姿態的人很多，老高則以一貫之風格，有定見，但不強加於人，他是真正的作家，不是說家，也不是行動家...他聽得多，說得少，從不搶白，更不會夸夸其談地爭鋒頭，他有老式文人的特點...。」

這就是首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安靜、卻蘊涵生命力；孤獨，而不乖僻離群的一條文藝之龍。（林乃文）